

“中国纪录片之父”去世

司徒兆敦曾是陈凯歌、田壮壮、张艺谋等著名导演的老师

据多位知情人士证实,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于8月31日凌晨去世,享年85岁。司徒兆敦是中国电影界最受人尊敬的泰斗之一,他致力于纪录片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,被誉为“中国纪录片之父”。

高徒遍天下

司徒兆敦,曾用笔名佐楠、梁梧舞等。1938年11月,他出生于中国香港,祖籍开平赤坎,1951年随家人移居北京。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,同年留校任教。1980年6月入党。1997年9月,被北京电影学院授予“金烛奖”。2016年07月,被中国电视纪录片学院奖授予“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杰出贡献奖”。2016年7月,被中法纪录片双年展授予德高望重的电影艺术家“终身成就奖”。

司徒兆敦曾拍摄电影《竹》《青山夕照》《父子婚事》;电视纪录片《路》《环境艺术》《光辉的历程》《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》;编著有《世界影坛佳

话》等著作。退休后,他担任青岛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导演系主任,继续组织从事教学活动。

司徒兆敦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级的班主任,黄金“第五代”的伯乐。可谓是高徒遍天下,像陈凯歌、田壮壮、张艺谋等著名导演都师从于他。作为纪录片师者,他毫无保留地、热情地教导很多青年导演、学生创作纪录片,杨荔钠、张经纬等无数人都得到过他的指点和鼓励。

司徒兆敦曾在采访中谦称自己“很有幸带了第五代”,回忆起第一次跟他们讲话时,他说,“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是苏联那套东西,我们是

从《战舰波将金号》起步的。经过这么多年了,电影怎么样了,我们完全不了解,对西方电影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也不敢说教你们,但是我有个优势,因为我父亲是管电影的,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大量的影片,对第五代这批学生的能力,我一点都不担心,因为他们人生态度、生活阅历,他们都有,这是现在的很多学生没法比的。我说那我们一起看电影,看了大量的电影,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,法国新浪潮,从这开始起步,因为商业电影我教不了,那个时候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社会,对商业社会完全不了解,也不懂。”

电影厂孩子

卷入“二流堂”和“上海藏书楼”事件被捕,那一年,他30岁,之后的五年,他在监狱中度过。

有着不同凡响的家族历史,几经时代命运的影响,司徒兆敦依然塑造出朴实无华刚正不阿的性格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,司徒兆敦自小就爱上电影。他在电影厂是从做杂活一步步做起来的。他自称,是属于中国第一代的“电影厂的孩子”。

在司徒兆敦撰写的《司徒兆敦谈纪录电影〈演员〉:“真实即美”的

审美观》一文中,他笔触犀利地抨击现实亦真诚地触及心灵。

“看《演员》,于蓝、于洋、秦怡这‘二十二大’的代表们,他们一直在强调演员不能只追求表面,要深入到角色的灵魂深处,只有深入生活,经过艰苦的努力,从思想到行为磨练自己,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,才能塑造好人物,没有捷径……在那个年代,演员不论大小,角色不管正反,都是庄重的,有尊严的工作。我长时间在拍摄现场工作,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,它让我永远怀念。”

没任何架子

教书育人,司徒兆敦可谓没有任何架子,总与学生平起平坐来谈,一起研究电影。

在教学中,司徒兆敦会建议学生扎根自己熟悉的精神土壤,从本土中寻找创作根本,他一直认为,“到西方去学,你其他都可以学,电影你学不了。学完了你也不能在那生存,这是我的观念,学技术没关系,学录音没关系,学故事片创作,你就根本没法生存。”

对于电影创作,司徒兆敦一直是观点明确:“纪录片是大家的,不是你的专利。故事片专业的第一阶段必须学纪录片,第二阶段学故事电影。我越来越坚定一个观点,电影没什么了不得,电影就是一门技术,它必须跟其他学科知识结合,它

才是有价值的。电影可以是各种样式,它也可以是商品,它也可以是政治宣传,它也可以是科学。”

因为剧情片烂片太多,司徒兆敦就强迫学生看纪录片,“不喜欢也得给我看,看够了纪录片你就发现,原来这些普通的脸是最漂亮的。”他强调,必须要从纪录片开始抓,通过纪录片的教育、渗透,转变我们的民族审美观。

有一位电影学院的学生说:“所有的老师看了我的片子后,都把我骂一顿,只有你教我如何将坏作品变成好作品。”

内蒙古籍青年导演呼可夫也是司徒兆敦的学生,毕业前夕,司徒兆敦曾私下问呼可夫毕业后的打算,他不假思索地表示要留在北京。

司徒兆敦却建议他“不要留在北京,应该回到内蒙古,好好走一走看一看,等小有成就之后再回来”。

当时,呼可夫听从了司徒兆敦的建议,回到了内蒙古寻找发展方向。

呼可夫说:“我是在城市长大的蒙古族,从前对自己的民族没有概念,直到上大学的某一刻,我突然对自己的民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于是看了大量历史文化类作品。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一直在拍消失的游牧文化,老师就让我回内蒙古扎根牧区,好好走走看看。如今才知道老师的建议是对的,因为我如果留在北京的话,现在也许就很难创作出好的作品了,也许就是拍拍广告什么的。”

要实事求是

妻子罗丽丹等。在这些珍贵和原始的影像片段里,观众得以见证时代的许多注脚。

在影片中,可以看到作为师者的司徒兆敦是如何启蒙学生的,但同时,他更像一个朋友,和学生对话,激发他们对日常的思考。

“纪录片所记录的东西,常常具有不可替代性。不可替代性就是价值”,纪录片伊始,司徒兆敦在香港城市大学授课,他以中国电影先驱之一黎民伟拍摄的孙中山为例,介绍纪录片的价值是如何产生的。

在纪录片中,能看出司徒兆敦

一生坚信的信仰和对电影深入骨髓的热爱。在举行告别派对时,司徒兆敦对着镜头说,“Louisa(魏时煜)以后会和这个摄像机结婚的”。活泼又风趣!

在北京电影学院,司徒兆敦说的一句话很有名:我可以原谅我说错话,因为我已经说了很多错话,但是,我不能原谅我说假话。他说:“什么是真事、真相、真理?这是我给学生必上的第一课,因为纪录片就要实事求是。”

敢说真话,认真做事,是司徒兆敦先生一生的本色。

据澎湃新闻

